臺大歷史學報第24期
1999年12月，頁427-432

BIBLID1012-8514(1999)24p.427-432

§ 書評 §

莫里茲及李明輝編，《儒學的源流、發展與展望》（Ralf Moritz and Lee Ming-hui (ed.): *Der Konfuzianismus: Ursprünge-Entwicklungen-Perspektiven*）

Leipzig: Leipzig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98. 278pp.

麥勁生*

德國學者對中國儒家學說的研究，早見於十七世紀。萊布尼茲（Leibniz）早年大力稱頌孔子的道德與自然哲學，引起歐陸哲士對儒學的興趣。及至十九世紀，赫德（Herder）、黑格爾（Hegel）及蘭克（Ranke）等一改態度，轉而大肆批評中國文化，儒家學說在德國哲學家及歷史學家心目中的地位大降。德國漢學成形於十九世紀末，受專業訓練的漢學家不再一味吹捧或刻意貶低儒家思想，反而較能深入了解孔孟之學精髓。百年以來，德國漢學人才輩出，精研儒學者亦大不乏人。可惜不少著作未被翻譯成較爲通行的語言，外界難以一窺全豹。近年中、德學者接觸頻繁，造就不少交流機會。中、德儒學專家雖然方法及見解未盡相同，但亦有不少相互發明之處。本書收集1997年4月18至19日於德國萊比錫大學舉辦之「儒學的源流、發展與展望」研討會中發表的大部份論

* 作者係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是次會議，得台北國立中央研究院及萊比錫大學東亞研究所大力支持，復得華語地區及德國著名學者如劉述先、黃俊傑、杜維明、顧彬（Wolfgang Kubin）及莫里茲（Ralf Moritz）等人參與，堪稱盛事。收入本書的論文普遍水準上乘，對研究儒學發展史及德國漢學現況的讀者而言，具有極高參考價值。

《儒學的源流、發展與展望》一書共有十四篇文章，分別編入「引言」、「源流」、「新儒學發展」、「近代儒學及傳統主義」及「展望」五部份。摩利茲及李明輝合撰逾四十頁的〈引言〉（Einführung）全面討論中國歷史演進和儒家學說發展的關係：春秋亂世如何造就孔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本道德主義及「內聖外王」的政治哲學、漢帝國時考試制度及官僚系統怎樣重新界定儒學的內容、隋唐佛教對儒學有何影響、宋代家族制度及書院制度如何改變儒學承傳的形式、以及西力東漸爲近代儒學帶來什麼挑戰等課題，都在〈引言〉中得到扼要精闢論述。只是，〈引言〉對十九世紀以來，一方面要肯定儒家價值觀的現代意義，另一方面又企圖在儒家學說中找尋現代化的動力的思想家，如康有爲及梁啓超等討論稍嫌簡短。同樣地，對於欠缺制度性支持的二十世紀儒學，如何能繼續發揮其影響力這個重大課題，〈引言〉尚可作進一步的發揮。

「根源」篇收入顧彬的〈人群中的人：儒學與回憶〉（"Ein Mensch unter Menschen:Konfuzianismus und Gedächtnis"），黃俊傑的〈中國詮釋學的特色：以《孟子》注疏的歷史爲例〉（"Die Besonderheiten Chinesischer Hermeneutik－Verdeutlicht am Beispiel der Geschichte der Menzi -Exegese"）及莫里茲的〈孔子與百世〉（"Konfuzius und die 'Hundert Zeitalter'"）三篇文章。表面上三篇文章題旨不同，但實際上卻都以儒學的承傳問題爲中心。回憶的研究，自二十世紀初法國年鑑學派提出，逐漸爲歐美歷史學及心理學家重視。顧彬的論文，以《論語》的對話形式爲題材，闡釋「我們今天認識的對話（Gespräch），是人類存在的一個先決條件；它不但藉著語言建立討論的基礎，亦體現於交談者、老師與學生以至人與人之間的言辭中。」（頁58）《論語》中孔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其門生對話，從中將他個人憶及的三皇五帝，典章禮樂流傳後人，使之成爲他們的集體記憶，再繼續流傳。後人學習《論語》，復將這種集體記憶繼續流傳。顧彬的作品，可以視爲一個大規模研究的起點。《論語》的對話形式，後人的解讀方法，《論語》的內容在歷代如何被再解釋，如何影響後人對三代的認識都是可供研究的重要課題。

顧彬的作品純粹針對《論語》的承傳問題。黃俊傑的〈中國詮釋學的特色〉則分析中國儒家經典如何被後人因爲不同的目的及需要而重新解釋。他以《孟子》爲例指出後人詮釋中國儒家經典，不離以下三個傳統：以個人修身爲目的的詮釋，以推動政治行爲及計劃爲目的的詮釋及因學派之間的論爭引起的詮釋。黃文指出朱子在《孟子集注》及《孟子或問》述及的「知言」及「養氣」和王陽明藉《孟子》發揚「致良知」之說，都是大儒詮釋《孟子》修身之術的例子。王安石、司馬光及康有爲等的作品則是藉詮釋《孟子》提出個人政治主張的典範。黃宗羲在《孟子師說》批評朱子，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批評黃宗羲，都可反映中國經典詮釋的第三種特色。黃文的最大優點是能顯出儒家經典的開放性與內在理路發展。莫里茲的〈孔子與百世〉以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就是：後人常指稱孔子旨在撥亂反正，重訂「禮」，爲何《論語》一書，對禮卻論之不詳？莫里茲的答案是，孔子重視的不是徒具形式的禮，而是發自內心的「讓」和「忠」這兩個觀念。「讓」使人各安其位，「忠」維繫人與人之關係，兩者相輔相承，缺一不可，禮僅爲這些情操之表徵（頁79~80）。孟子重心性，荀子重制度，他們各執一端，發展出儒學的兩個典範。至漢代大一統建立，董仲舒在新社會和政治環境之中嘗試調和兩者於「天人之學」中。本文結論指出十九世紀後中國面臨巨變，如何重整秩序爲儒者之時代任務。

「新儒家的發展」收集耿寧（Iso Kern）的〈王陽明與其門人對「良知」與「見聞之知」的關係的討論〉（"Die Diskussion des Verhältnisses zwischen 'ursprünglichen Wissen' (liangzi) und empirischem Wissen (jianwen zhi zhi) durch Wong Yangming und Seine Schuler"），劉述先〈最後一位新儒家哲學家：黃宗羲〉（"Der letzte neokonfuzianische Philosoph: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uang Zongxi"）及奧馬波恩〈歐洲哲學中的神義論及新儒家對邪惡起源的解答〉（"Das Theodizee-Problem in der abendlandischen Philosophie und die Beantwortung der Frage nach dem Ursprüng des Bösen im Neo-Konfuzianismus"）。耿寧的文章討論王陽明學說中一個核心的問題，即「良知」與「見聞之知」的關係。文中指王陽明縱然堅執直指本心的良知，但卻也從未徹底排斥「見聞之知」。耿寧以爲王陽明的學說顯示「良知容納各種經驗知識，各種經驗知識亦源自良知」（頁101）。王陽明強調良知衍生各種經驗知識，前者爲本，後者爲末。王之門人歐陽德及王畿始將「良知」和「見聞之知」對立起來。本文結論謂王陽明相信人有發自內心的「仁」，但亦須靠「見聞之知」去肯定所言所行是否合宜（頁110）。劉述先的文章指出學者一向認爲黃宗羲雖著有《明儒學案》，但本身卻少有哲學創見。其實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大力發揚劉宗周之學，其目的是要借其師之學，表達他個人協調朱子及陸王之學的看法。朱熹將「尊德性」及「道問學」分隔開來，而「王陽明首先質疑朱熹的二元論，劉宗周往此方向繼續探索，黃宗羲綜合兩者學說，並提出『理一分殊』的解釋」（頁127）。耿寧及劉述先的文章紮實之餘，亦不乏新創見。相比之下，奧馬波恩的文章顯得單薄。他以西方的聖奧古斯丁的神學爲出發點，指出西方神學因爲強調上帝爲至善，故難以解釋邪惡事物何來。奧古斯丁以人的「自由意志」解釋人作惡之原因，仍然十分牽強。奧文強調宋儒所謂「天地之性」兼容好壞，邪惡之源在於人不能揚善去惡。惜此文篇幅短少，論說意猶未盡，更未援引個別宋儒之說強化論點。

第四章「近代儒學及傳統主義篇」收集四篇關於張君勱，熊十力及牟宗三三位近代大儒思想發展歷程的論文。吳展良的〈中國五四時代的新浪漫儒學與反理性主義〉（"Neoromantischer Konfuzianismus und Anti-Rationalismus in China zur Zeit der Vierten-Mai-Bewegung"）以張君勱的哲學探索爲主題，反映出五四時代一部份儒家學者，從崇拜西方啓蒙時代的理性哲學，回歸到儒學的心靈及生命哲學的歷程。文中對張君勱如何結合十九世紀末歐洲新浪漫主義，德國古典哲學及新儒家哲學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甚詳。對張君勱如何批評「科學主義」（頁154）及「物質文明與現代社會」亦有清楚闡釋。郭嘉碧（Gabriele Goldfuβ）的〈以傳統爲前途一熊十力晚年作品的生命觀〉（"Tradition als Zunkunft Batrachtung zu Leben und Spätwerk von Hsiung Shih-li (1885-1968)"）利用印度史專家羅特文（D. Rothermund）對「傳統」的理解，重新認識熊十力晚年的哲學。根據羅特文的看法，傳統主義者不獨厚古而薄今，他們立足現代，卻從傳統的觀點出發，重新認識及定義部份與他們的目標不相符的歷史（頁178）。文中指出從1911至1918年，熊十力經歷革命及戰爭的洗禮，不再認爲傳統儒學足以解答中國當前的問題。相反，當時風行的佛學卻驅使熊十力深入反思佛學。然而熊十力未因此入佛，反而重回儒家，好像康有爲般將儒學經典選擇性地重新認識。這種做法使他一度認同激烈的社會革命，此文不但道出熊十力一生的學術轉折歷程，亦表現出儒學在起伏連連的近代中國的遭遇。暮勒（Hans-Georg Möller）短短六頁的〈以馮友蘭的《新理學》爲例論新儒學的哲學觀點〉（"Eine philosophische Standortbestimmung des Neukonfuzianismus am Beispiel der *Neuen Metaphysik* Feng Yu-lans"）野心似乎過大。暮勒的文章強調馮友蘭融匯中西哲學的企圖。西方哲學中的「呈現」（Repräsentation; Representation）問題，涉及意符（signifikat; signifier）及意指（signifikant; signified），現象及實有（reality）的關係。此問題自柏拉圖時代起至今天的後現代社會仍是重要哲學課題。暮勒的文章謂馮友蘭《新理學》所論「存在」及「潛存」，「實際」及「真際」，「物」及「理」，正是要爲這個源自西方的重大哲學課題，提出一個中國式的答案。然而全文未充分辨清西方的哲學問題與馮友蘭的《新理學》是否可以等量齊觀。雷奧夫（Olaf Lehmann）及康特（Hans-Rudulf Kantor）的文章俱以牟宗三的哲學爲題。前者〈近代儒學的「學」與「辯」——牟宗三論申述與論證〉（"Moderner Konfuzianismus zwischen 'Lehre' und 'Argumentation' zum Problem von Anspruch und Begrundung bei Mou Tsung-san (1909-1995)"）深刻描寫處於西方文化猛烈衝擊中國文化時代的牟宗三，致力以中國文化爲本位，試圖吸收西方文化與現代化的精髓。文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特別指出牟宗三的三種貢獻：（1）以實踐道德爲基礎，建立道德形而上學，藉此克服康德的二元世界論（頁207），（2）宣揚人的智性，以建立客觀世界的可知性（頁208），及（3）指出人的行爲、思想和創造爲「意義」（Bedeutsamkeit）的來源。此文在深度及視野上都是文集中相當突出的。相較而言，康特的作品題爲〈天台宗與牟宗三的道德本體論〉頗有偏差。全文側重討論天台宗之義理，對天台宗啓發牟宗三哲學之處反而少有論及，故讀來稍有文不對題的感覺。

〈展望篇〉收錄李明輝及杜維明兩位當今新儒學健將對當代儒學發展的論斷。李明輝的〈中國當前的儒學熱〉（"Das Konfuzianismus-Fieber im heutigen China"）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學熱潮的討論源自大學及傳播媒介的互相影響」（頁236）。他從各種儒學研究機構及基金的成立，大學課程、期刊及學術會議對儒學的重視，官方意識形態掌管機構對儒學的容忍態度等，清楚解釋儒學在中國大陸重獲重視的客觀原因。倘文章能再討論當今中國知識階層的生活條件及心理狀態，便更能揭示儒學吸引年青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因。杜維明撰寫有關新儒家發展的文章可謂多不勝數，本文集收錄的〈從儒學角度看全球社群的基本價值觀〉（"Eine Konfuzianische Sicht auf die Grundwerte der globalen Gemeinschaft"）除了重申儒學重視的各種觀念如自我、群體、自然和天等等觀念如何可以改正西方自啓蒙時代以來迷信理性及崇尚物質進步的問題外，更根據東亞發展經驗，具體指出東亞式的有爲政府、禮義、家庭、公民社會、教育及個人修養未嘗不可供西方人借鑑（頁256~260）。杜教授對儒學世界化的方法及過程亦甚有見解。讀者若嫌這篇文章在這方面討論太少，可以參考他的其他作品。

這次「儒學的源流、發展與展望」研討會是中、德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亦是中、德學者互相砥礪的大好機會。無緣出席是次會議者，可以細讀本論文集，想像孔孟的教誨飄蕩於德國古城萊比錫的空氣中。

（責任編輯：張藝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